

香港與中國之間的互動，以1989年開始持續不斷的民主運動最為觸目，香港人爭取在1997主權移交後的香港落實全面民主選舉和高度自治，以民主來維護有別於中國的制度及生活方式，但每次爭取都被2000多公里外的北京政府否定，激起2014年的雨傘運動和2016年的旺角騷動後，北京又打算進一步強加《中國憲法》於香港，以國家安全限制言論及結社自由。

在壓抑港人民主訴求的同時，北京多年來也不斷透過經貿政策和區域規劃，以城市發展邏輯取消政治合法性的問題，利用大陸腹地將香港吸納並消融於新定的區域結構中。

「粵港澳大灣區」規劃是新一輪而且最認真的嘗試

。如何既能強化對香港的控制令其「不作亂」，同時維持適度的制度差異和信譽以助中國經濟發展，是北京不斷要琢磨的問題。

本文嘗試簡述北京、香港特區政府和親中精英，以及香港民眾對大灣區規劃的主動盤算和被動回應。

一：大灣區簡介 特區上的特區

根據維基百科：「粵港澳大灣區，是由圍繞珠江三角洲伶仃洋，包括香港、澳門、廣州、深圳、珠海、佛山、中山、東莞、肇慶、惠州和江門的城市群組成，是繼美國紐約

都會區、美國

舊金山灣區和日本東京都市

圈之後，世界第四大灣區。2015年，灣區城市群的GDP總量達1.34

萬億美元，總人口6618萬人，人均GDP為20,255

美元。粵港澳大灣區由中國國務院

總理李克強在2017年3

月召開的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推出。李克強提出要推動中國內地與香港、澳門特區的深化合作，研究和制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，以香港和澳門的獨特優勢，提升中

國的經濟發展.....2017年7月1日.....

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粵港澳三地政府簽署了《深化粵港澳合作
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》。」(1)

中國目前實行黨國控制的資本主義，其中一個推動經濟發展的工具就是從上而下的
都市/

區域規劃及新城建造。跟

紐約、舊金山和東京灣區不同，粵港澳

大灣區是一個由政權

指定的經濟發展範圍，雖然具體政策文件

《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》仍未公布，一般預料會在香港和澳門兩個行「一
國兩制」的特別行政區之上，再劃一個特別範圍（特區上的特區），而範圍內會特設
貿易和生活制度，引入更多資金和人口，加強十一個城市的整合，向國家指定的方
向發展（如圖1）(2)。

圖 1 —— 粵港澳大灣區各市的產業佈局



香港人對中共的「特區」概念並不陌生。早在1949

年，中共高層按「長期打算，充份利用」的原則，決定解放軍不進佔香港殖民地，容許香港的政治和經濟制度異於中國大陸，同時利用差異協助中國發展。由上世紀50年代的貿易窗口，到70年代末模仿香港發展深圳經濟特區和吸引港資回珠三角洲城鎮設廠，算是首兩個階段。

深圳是中國第一批由零開始的「特區」，1997年和1999年，主權移交後的香港和澳

門成為第二批「特區」，北京也着手將香港和澳門拉進全國的經濟結構中。

第一個環節是把握香港經濟衰退的機會，在2003

年與香港簽署《內

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

安排》（CEPA

），放寬國內專業服務行業市場與香港企業，又放寬中國遊客來港自由行，被視為香港經濟復甦的救命草。

第二個環節是基礎建設的接軌。主權移交21年，新增五項連接香港及珠三角城市的陸路跨境基建，由西至東包括港珠澳大橋、深港西部通道、廣深港高鐵、落馬洲支線和蓮塘口岸。

第三部分是與CEPA

差不多並行開展的珠三角地區「區域規劃」。城市規劃一直被視為香港自主的內部事務，香港的規劃部門只負責境內規劃，與周邊城市各自發展和競爭。然而，香港其實很早就被北京納入「區域規劃」的棋局中。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在1988年表示，「

現在有一個香港，我們在內地還要造幾個『香港』」(3)，深圳特區的選址，本身就打算與香港形成「雙子城」的格局，繼而「同城化」。

到2006年，

《大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

發展規劃研究》、國務院於2008

年公布的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

展規劃綱要（2008 - 2020年）》，以至於2010

年由粵港澳三地共同提倡的

《環珠江口宜居灣區：建設重點行動計劃》。宜居灣區的研究範圍包括香港和澳門，以及環珠江口五市（廣州、東莞、深圳、中山、珠海）鄰接珠江出海口水域的19個區，「探討如何促進「環珠江口灣區」（下稱「灣區」）成為大珠三角區域內一

個既有優質生活、又有蓬勃經濟發展的核心地區，並就此願景提出原則性和方向性的建議，供三方各自進行規劃時作參考。」(4)

「宜居灣區」的討論方向集中於城市設計及連結，例如「綠網」〔自然生態網絡〕、「藍網」〔臨海和河畔休憩空間〕和「公共服務網」等主題，仍然流於空談，但已為「粵港澳大灣區」奠定雛型。

二：香港信譽大灣化加強控制

根據2017年簽署的《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》〔見圖2〕，區域化主要想做三件事，〔一〕是加強合作，減少競爭；〔二〕是鼓勵香港和澳門人到大灣區其他城市創業就業；〔三〕是引入香港在金融和專業服務上的國際信譽，協助大灣區其他城市國際化，一起「走出去」。

圖2 —— 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歷程



一是說了等於沒說的廢話，二和三才是重點。在中國的主流論述中，香港近年被形容為僵化沒活力，必須靠「祖國」多番特別支持才能撐過來的城市，香港人卻不懂得感恩圖報，反而不斷與共產黨對抗，挑戰中央政治底線。大灣區要做的第三件事，就是給香港一個回饋「祖國」的機會。

大灣區內其他較未國際化的城市，需要建立國際上信賴和接受的制度和運作模式，以吸引國際投資者進場，過程中或許先由區域化才能有效過渡至真正的國際化，其中尤其是貨幣國際化和專業國際化方面，最需要香港協助。

以高等教育及科技研究為例，大灣區內有5間位列「QS世界大學排名」前100位的大學，乍看與世界其他灣區有過之而無不及，實際上5間都是在香港境內。這些院校近年陸續有計劃在大灣區城市開設分校或附屬醫院，從而整體提升大灣區學術研究的公信力和國際影響力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香港各大學的科研學系，不少已經由「海歸」的中國學者掌舵，因此更有意志借香港之力幫大灣區一把。

至於(二)更是可圈可點。香港本來就很國際化，可以用國際城市的身位協助大灣區發展，但北京非要先拉香港進大灣區區域化不可，更明言要把香港人吸離香港。區域化的核心是制度趨同，無論是貨幣、法律系統和社會制度；香港行「一國兩制」，有自己的法治和國際認可的專業操守，才得以維持金融中心的信譽，除非北京決定將香港一制適用於大灣區所有城市，讓所有居民都享有香港人的基本權利，否則大灣區必定會與「一國兩制」產生矛盾，損害香港的自主和國際信譽。

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員林行止因此反建議：「香港仍然保持不變，即保持與內地（「大灣區」其他城市）有別的獨特性（當然不是獨立），比如應好好守護對「大灣區」的經濟活動最具實用價值的司法及金融制度，而達此標的唯一方法，是令香港獨「善」其身。「大灣區加香港」（GBA Plus HK），相信遠較「粵港澳大灣區」（GDHKMC）實用！「實用」指的是香港對內地仍有利用價值，最低限度，香港的強項如法治與金融業應保持不變形不走樣，如此才能對「大灣區」的形成與拓展發揮積極功用。」(5)

要「利用」香港就須維持香港的獨特和自主，林先生的建議對大部分港人來說理所當然，但看北京近年對港政策，他們似乎是相信必須加強控制多於保護「特區之特」，而且不擔心傷害「特區之特」會破壞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以至大灣區的發展前景。近兩年，北京接二連三透過特區政府破壞香港的政治體制，從取消議員資格到計劃取締主張香港獨立的政黨，公眾對新聞自由的評價創新低(6)，司法獨立排名又急跌(7)，但破壞帶來的認受性損失（legitimacy loss）已遞減，公眾失去反抗意志，投資也沒有撤走的跡象。北京因此愈來愈有信心，按自己的想法發展一個不會反抗，只會賺錢的新香港。

所謂敬酒不吃吃罰酒。北京一邊給香港人「罰酒」，一邊賞「敬酒」，大灣區是香港人「無法拒絕的糖衣毒藥」，也算「敬酒」的一種。

大灣區規劃強調鼓勵香港人到大灣區創業就業養老，明顯是要利用大陸腹地的縱深，模糊香港明文的邊界，以及無形的制度，也讓更具生產力的內地大灣人，到香港取而代之。最直接的影響是，當長居於大灣區的港人數目日增，足以左右香港的議會選舉結果，甚至可以提出在大灣區投香港的票，令親北京的政黨無論在選票上和議席上都取得大多數，再無後顧之憂。

三：特區精英「政治順從私利先行」

有不止一位香港學者形容，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，並非什麼現代新發明，而是古代帝國對偏遠地區實行間接管治的土司制。由土司統治的地方聽命於天子，同時可以保留獨特而傳統的社會政治結構。(8)

土司制用現代政治術語翻譯，就是「非民主自治」(undemocratic autonomy)，由天子欽點的香港特首，上要跟隨北京的大方向，中要照顧親中精英的利益，下要香港一般平民百姓日子不太差，當然也不需要很好。

特首林鄭月娥在《施政報告》提及大灣區的段落說：「

特區政府會積極參與推進大灣區建設，為香港推動產業多元化創造有利條件，特別是在拓展創新及科技發展方面。此外，我們會爭取為港人在大灣區學習、就業、創業、營商、生活以至養老提供更多便利，促進兩地人流、物流、資金流和訊息流，使大灣區能夠成為港人的優質生活圈。」(9)

這番說話可以看到作為香港土司的特首對大灣區的三個立場，首先是必須同意北京透過大灣區規劃加強對港控制的大方向；第二是向親中精英輸送利益，讓商界及專業界得到比CEPA更好的落戶及稅務安排；第三是「解決人民」，利用大灣區較廉價的生活成本，將難以負擔香港生活的長者或基層市民「疏散」到當地去，既減低針對政府的壓力，亦能將更多港人成為北京的「政治人質」。

另一邊廂，儘管區域化強調合作而非競爭，然而香港政府這兩年的經濟政策，還是

以追趕深圳的創科產業為重心，不會接受自己繼續專攻基礎科研，然後將應用技術的主導權讓給深圳。香港科技大學畢業生汪滔在香港研究無人機，最終卻在深圳才成功營運大疆創新，至今還是特區高官和親中精英引以為鑑的教訓。

四：反對派缺經濟實力 港人欠政治出路

至於一般民眾，無論大灣區規劃如何，他們也無從置喙。所謂一國兩制，港人治港，實際上是土司和親中精英跟隨北京旨意起舞，當民眾連本地的關鍵決策都難以扭轉，中港之間簽的協議就更加遙不可及，如果不涉及香港政府開支和本地立法，連香港立法會也無權制止，更談不上提出另類可能。

大灣區這項聲稱關乎香港命運的區域計劃，在香港沒有進行任何公眾諮詢，也沒有不同選項，只能聽候北京公布細節。因此，「大灣區」成為主流傳媒日日講，但沒有香港人明白的政治密碼。

一名大學講師跟我說：「政府鋪天蓋地宣傳大灣區，其實會北上就業的早已去了，不喜歡的就更反感。有些中年男子變憤青，白天炒股上班，夜晚上網狂罵，有子女的想辦法送出國。」當香港政府不斷宣傳未來的光明不在香港，而在大灣區時，許多以香港為家的香港人，覺得無處可逃，卻不知如何力挽狂瀾。

香港政治反對派面對大灣區這個香港境外的話題，同樣無從發力，只能對主流論述作些修補。譬如身為立法會民主派召集人的莫乃光議員，在5月31日立法會有關大灣區的無約束力議案辯論上提出，「香港特區政府必須確保香港在『一國兩制』下，保持其在法治制度、國際金融服務、知識產權、專業精神、資訊自由流通等方面的獨特優勢，以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中維持長遠競爭力」。(10)

香港稍有實力的本地資本家都靠攏北京，反對派在經濟發展上無力提出截然不同的主張，民心也更渙散，再苦口婆心呼籲北京磨刀霍霍之時尊重「特區之特」，無異於對牛彈琴。

作者朱凱迪為香港立法會議員

(1) <http://bit.ly/2vmyljn>

(2) 圖1和圖2取自香港立法會文件<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research-publications/chinese/1718fs03-overview-of-guangdong-hong-kong-macao-bay-area-20180223-c.pdf>

(3) <https://medium.com/recall-hk/f-140cebc4f9dc>

(4) <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3-14/chinese/panels/dev/papers/devcb1-795-1-c.pdf>

(5) <http://bit.ly/2OMVFi9>

(6) <https://www.hkja.org.hk/site/portal/Site.aspx?id=A1-1633&lang=zh-TW>

(7) <http://bit.ly/2OfVV8i>

(8) <https://cn.nytimes.com/opinion/20170703/china-hong-kong-xi-jinping/zh-hant/>

(9) https://www.policyaddress.gov.hk/2017/chi/policy_ch03.html

(10) 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7-18/chinese/counmtg/motion/m_papers/cm20180523cb3-587-c.pdf